

挣扎还是静待结局：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政权

[作者]：琅邪中华文化网

[单位]：琅邪中华文化网

[摘要]：后主建兴 12 年（公元 234 年）秋八月，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中。至此，统共 120 的《三国演义》已经写到了第 104 回，后面的文笔就不多了。文学家如此安排当然有他的道理，因为以后的“故事性”确实就不大了——蜀汉偏僻微弱，政治又不如诸葛亮时期，难以对天下形势有太大的悬念，灭亡是早晚的事情。但是从历史的眼光看，为期 40 年的蜀汉政权刚刚度过了 11 个年头，后面内还有近 30 年的路要走。这 30 年的路，整个蜀汉政权是在挣扎与等待的矛盾和痛苦中度过的，细心挖掘和品味，它留给后人的或许要更多，也更为沉重……

[关键词]：后诸葛亮时代，蜀汉政权，诸葛亮

后主建兴 12 年（公元 234 年）秋八月，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中。

至此，统共 120 的《三国演义》已经写到了第 104 回，后面的文笔就不多了。文学家如此安排当然有他的道理，因为以后的“故事性”确实就不大了——蜀汉偏僻微弱，政治又不如诸葛亮时期，难以对天下形势有太大的悬念，灭亡是早晚的事情。但是从历史的眼光看，为期 40 年的蜀汉政权刚刚度过了 11 个年头，后面内还有近 30 年的路要走。这 30 年的路，整个蜀汉政权是在挣扎与等待的矛盾和痛苦中度过的，细心挖掘和品味，它留给后人的或许要更多，也更为沉重……

一、诸葛亮留给蜀汉政权的班底

后汉时期，辅汉安刘、实现汉王朝第二次中兴是刘备集团的口号也是他们的梦想。他们离这个梦想最接近的时候是在公元 219 年，即汉献帝建安 25 年夏天，当时的刘备占有川中，关羽镇守荆州，是年又从曹操手里抢占了汉中重地。秋天，刘备进位汉中王，大封文武。当时刘备诸葛亮虎视天下的雄心可谓饱满。但是蜀汉政权的这个繁盛局面却又丧失地太快太悲凉了——

建安 24 年（219 年）年末，孙权袭杀羽，取荆州，刘备集团痛失一条臂膀；

章武 2 年（222 年），刘备伐蜀，大败于猇亭，次年驾崩于永安；

其实，这时候留给诸葛亮的就只剩下主观努力的空间了，他在《后出师表》中说的很明白：今伐魏亦亡，不伐亦亡。——但是，诸葛亮还是对魏保持了战略上的攻势，不管是意图自保还是为了灭敌，司马懿“畏蜀如虎”则是《三国志》记载的事实。

刘备去世后，诸葛亮总揽大权，他为这个政权也真做到了“鞠躬尽瘁”，公元 234 年以后的蜀汉政权，可以说是诸葛丞相留给后主的遗产。而此后 30 年的当权者班底，也都是诸葛丞相悉心简拔和培养起来的。诸葛亮的这份遗产有如下特征：

（一）消除“不稳定因素”。

1，李严：和诸葛亮同为托孤重臣。但居然劝诸葛亮加九锡，走曹操的路线，遭到拒绝；后又在北伐期间“出工不出力”，耍手腕。公元 231 年，免为庶人；

2，魏延：受刘备重用的良将，由于与诸葛亮多有不合，性情高傲。诸葛亮临死授意，由杨仪、王平等入攻杀，灭三族；

3，杨仪：为丞相长史，有才干，性情偏狭浮躁，公元 235 年被免废，徙汉嘉郡。退出政治舞台。

（二）留下可靠班底

其实只要看过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里面称赞下属的词语——如“忠志之士”、“良实”、“忠诚”等等，大体就可以知道诸葛亮的用人标准了。的确，诸葛亮也确实为后主留下了这么一

批人格上无可挑剔的文武大臣，从以后几十年这些人的表现来看，你不得不佩服诸葛亮的眼光。所以，以后的几十年内，蜀汉是三国中最稳定的一个政权；但是同时，由于用人唯“贤”，不同于曹操的“唯才是举”，也就决定了这批人难以完成什么惊人的业绩了。凡事不能两全，至于得失几何，也真是一笔不好算的帐。

（三）后诸葛亮时代的政权设计

废除丞相。诸葛亮是大权独揽的，但他以后的政坛更多的是一个班子的分工与和衷共济

1，皇帝。从 40 年的经历来看，刘禅对政治似乎没多大的兴趣插手，对大臣也算温和宽容，这似乎也不完全是坏事。但皇帝毕竟是最高机构，也很有点复杂。

侍中：是皇宫中的负责官员；

宦官：后期有专权的倾向。

2，大将军。主管军国大计。

3，尚书令。主管政事，是政务主持者。由于蜀汉很大程度上是军事政权，尚书令位在大将军以下。

——此外众多文武职务都是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建立的。

二、蒋琬时期（234-243 年）：北伐战略转变的努力与失败

按照诸葛亮的嘱托，后主任命蒋琬主持局势凡 10 年，前期，蒋琬在诸葛亮去世的震荡中指挥若定，稳定了蜀汉局势。后期，他试图转变诸葛亮的北伐策略，由于遭到普遍反对而失败，自己也随之病亡。

（一）蒋琬

蒋琬，字公琰，零陵湘乡人。“以州书佐随先主入蜀”，被任命为广都长。刘备到广都视察，发现他居然根本不理事务，经常喝得烂醉，先主大怒，要治他的罪。诸葛亮说：“蒋琬，社稷之器，非百里之才也。其为政以安民为本，不以脩饰为先，原主公重加察之。”——呵呵，后来罗贯中把蒋琬的光荣事迹按在庞统名下了。但结果是，刘备虽然没有整他，还是罢了他的职。但蒋琬成为诸葛亮的心腹，先主去世后，他的官职是火箭一样飞腾的。230 年，做了长史，主管丞相府政务，加封抚军将军。诸葛亮曾经密表后主：“臣若不幸，后事宜以付琬。”——你办事，我放心！最终成功当上了诸葛亮的接班人。

（二）和衷共济阶段

234 年，蒋琬被任命为尚书令，235 年，又领益州刺史，做了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封安阳亭侯（不久费祎任尚书令，主持政务）。

当时诸葛亮新丧，远近危悚，内外不安。蒋琬同志作为百官的领袖，表现出“出类拔萃”的魄力和镇定，上朝的时候在百官面前，“既无戚容，又无喜色，神守举止，有如平日，由是众望渐服”，真有后世王导、谢安的风度和气质。由于他的自信和沉着，蜀汉内部逐渐度过了这个震荡期。期间也有些值得一提的事迹——

比如，东曹掾杨戏是个放旷的家伙，蒋琬和他探讨问题，他居然理都不理，于是有人从中点火：“老大，你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！”蒋琬只是一笑：“这没什么。大概是杨戏不同意我的看法，如果表示赞同呢又觉得虚伪，如果当面反驳呢又觉得我没面子，所以才不说话。杨戏是高人啊！”

还有，督农杨敏背后诋毁蒋琬，说他作事糊涂，确实赶不上老丞相诸葛亮。有人就打了小报告，蒋琬却说：“我的确不如诸葛丞相，这么说是对的啊。”主者重据听不推，则乞问其愤愤之状。后来杨敏因事犯罪，众人认为他死定了，谁知道蒋琬根本没有心存芥蒂，更没有秋后算帐的打算。

在国家安全方面，镇北大将军王平坐镇汉中，防御曹魏；车骑将军邓芝坐镇江州（重庆），应对孙吴；安南将军马忠与张疑则负责南方事务，都是一时优秀的人选。从建兴 12 年（234

年)到延熙元年(238年)的四五年间,蜀汉内外稳定,国人似乎也增强了信心。

(三) 求变与内部争论时期

公元238年,后主改元延熙,似乎预示着万象更新、雄图再展的意思。果然,据《三国志-后主传》记载,这年冬天,后主命蒋琬出镇汉中,与东吴东西呼应,共同伐魏,言辞壮烈——根据刘禅同志一贯的习惯,这应该也是蒋琬等人的工作,皇帝做做样子而已。239年,蒋琬加大司马。

在汉中考察了一段时间以后,蒋琬似乎开始深入考虑伐魏的策略问题。他认为,诸葛亮多次出秦川伐魏,但是因为道路艰险,运输困难,每每徒劳无功,应该进行战略的调整——不如在汉中沿汉江东下,攻取魏兴、上庸。这里曾经是蜀汉的地盘,成功的机会应该比较大。于是制造战船准备行动,但因为得病没有马上实施。

没想到这个计划引起了朝廷内外的激烈争论,大部分人认为,这样做太冒险,一旦不顺利,再逆流回来十分困难,所以不是万全的“长策”,太冒险了!延熙4年(241年)10月,后主专程派费祎和姜维到汉中和蒋琬“谘论事计”——其实就是阻止蒋琬似的计划,其实也可以看得出费祎是这个计划的坚决反对者。于是,这个计划就只有胎死腹中了。其原因:第一,这些人都是诸葛亮的部下,自然有诸葛亮的遗风,他生平谨慎,不可弄险的风格自然影响了大部分属下;第二,后诸葛亮时期的蜀汉政权是一个集体负责性质的政权,没有绝对的权威,这种“合议制”的特点是因循和庸俗,是很难通过什么高妙的议论的;第三,众人说的很有道理,即使拿下上庸,因为那里无险可守,早晚还是别人的——关羽守荆州就是例证!

(四) 无奈的折中与得病

这场争论几乎持续了两个年头,闹得纷纷扬扬,但是蒋琬似乎也认定了,出兵垆川必然是死路一条。但在所谓“太平盛世”,守旧派往往是胜利的一方。于是,延熙六年(243年),蒋琬向后主提出:1,我在汉中已经6年,身体不好;2,魏国强大,难以消灭,出兵垆川是正确的,推荐姜维为凉州刺史,经营那里;3,申请自己回到涪水,那里四通八达,可以接应各路人马——其实就是申请吊离的意思了。

这个“折中”的方案其实就是费祎等保守派的胜利,自己回到后方,究竟是赌气的举动还是依然坚持自己的计划,恐怕两个因素都有吧。

243年10月,蒋琬自汉中还,驻扎在涪水。

当年,费祎接替蒋琬的大将军职务。

延熙9年,即公元246年,蒋琬病逝。

三、费祎时期(243-253年): 坚定的守成路线

说起来,诸葛亮以后的三位当政者——蒋琬、费祎、姜维,虽然都是诸葛亮生前信赖的部下,但是他们的执政方针却是各不相同,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当时蜀汉政权里面的主要问题了。

现在轮到了费祎,一个坚定但不失优秀的保守主义者。

(一) 费祎

费祎字文伟,江夏鄆人也。和原来的益州牧刘璋还算远亲。因此年轻时候就到了川中游学。先主刘备平定蜀中,费祎就留在这里了。与汝南许叔龙、南郡董允齐名。论者认为费祎同学最为优秀。刘备立刘禅为太子,费祎与董允都做了太子舍人,又升为庶子。后主登基后,为黄门侍郎。225年12月,诸葛亮平定南中归来,大臣们出城数十里逢迎,费祎费祎也不显眼地跟在后面。大家没想到,诸葛亮居然让费祎这个年轻干部和自己同坐一车,从此大家才对他另眼看待,从此他也就成了诸葛亮的心腹——个人认为诸葛丞相这么做很不妥当,影响不好,呵呵。

不久,诸葛亮就命他为昭信校尉,出使东吴。面对孙权和手下的人才们,费祎除了喝高了几回之外,其他方面都出色完成了任务。回来后就被提拔为侍中。

诸葛亮北住汉中，申请费祎为参军。后来当中护军、司马。当时军师（呵呵）魏延与长史杨仪互相憎恶，在一起讨论问题经常吵架，魏延有时候居然拿刀在杨仪头上比画，而杨仪则是委屈得“泣涕横集”：同志们哪，你们看他什么态度哇！这时候费祎就充当和事老的角色，倒也成功。

234年，诸葛亮去世，费祎为后军师。不久，代蒋琬为尚书令。公元243年，费祎接替蒋琬的大将军职务，开始了自己执政的10年。

（二）对魏的防御态势

诸葛亮去世时，司马懿曾经想大举攻打蜀汉，没有获准，以后的一段时间，魏国给蜀汉的压力并不巨大。237年，辽东公孙渊叛魏，司马懿用了将近2年时间平定；239年，魏明帝死，司马懿不久被解除兵权，直到公元249年，司马懿父子才杀曹爽，夺回大权。但是此后司马与曹氏之间的斗争还是比激烈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费祎的守成政策执行起来就不那么吃力。

延熙7年（244年），魏大将军曹爽伐蜀，王平成功退敌，费祎也到了汉中。

延熙10年（247年），汶山平康夷反，被姜维讨平。

延熙11年（248年），斋涪陵地区少数民族造反，被车骑将军邓芝讨平。

——以上都是小打小闹，没什么意义。费祎做了10年太平宰相，不但没什么危机，还颇有些喜事呢：

247年，凉州胡王白虎文、治无戴等率众降汉；

249年，魏国司马懿杀曹爽，魏国右将军夏侯霸来降。

（三）更加关注内部和谐

由于并没有伐魏的强烈愿望，费祎更关注国内的安定与治理，所以也不象诸葛亮、蒋琬那样，长期驻守在汉中，而是更喜欢呆在成都。即使自身在外，中央一旦有什么重大决策，也往往在外面遥控。

延熙14年（251）年夏天，费祎在成都，成都的“风水先生”告诉他，成都“无宰相位”，于是，费祎当年冬天就搬到北边的汉寿去办公了——作为一个执政，这个行为倒是滑稽，也可能另有内因吧。

（四）与姜维的路线之争

与费祎相反，姜维却是个激烈的伐魏主义者，早在蒋琬时期，姜维就多次带偏师伐魏。在姜维的强烈要求下，费祎先是耐心劝导：“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；丞相犹不能定中夏，况吾等乎！且不如保国治民，敬守社稷，如其功业，以俟能者，无以为希冀微幸而决成败於一举。若不如志，悔之无及！”这个等于说国家完全没有前途了，姜维当然不能满意。于是，费祎勉强同意姜维出兵，但作为大将军，只给他不足1万的兵力。

247年，姜维出陇西、南安、金城界，与魏大将军郭淮、夏侯霸等战於洮西；

249年，又出西平伐魏，不克。

——费祎算是有了借口：怎么样，不行吧小伙子！但姜维自然也不会服气，原因很简单。

（五）意外的死亡

费祎是个好同志，团结干部，性情温和，本来应该是个长寿的长者，但是他身上的两个特征导致了他以外的死亡：

一是“博爱”，对什么人都信任和推诚，即使对于刚投降过来的人也不加防范，安全意识不强。张疑将军就劝过他：“东汉的大将昔岑彭、来歙，都是被刺客杀害的，您这么位尊权重，应该保持点警惕啊。”

二是好酒。前面说过，年轻时候出使东吴他就喝高过，这个习惯实在是太顽固了。

延熙16年新春，费祎与群僚聚会饮酒，费祎大罪，竟然被魏国诈降的刺客郭循手刃而死，可惜了一代太平宰相。

四、姜维时期（253-263年）：兵力的损耗和内政的腐烂

费祎一死，再没有人可以阻止姜维伐魏的雄心，然而当时魏国的司马氏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，内部趋于稳定，因而他连年大举出兵，基本没占到什么便宜，反而损耗了蜀汉原来就很薄弱的兵力。更可怕的是，蜀汉朝廷内部也日益腐化——整个蜀汉政权已经走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。

（一）姜维

姜维，字伯约，天水冀人。建兴6年（228年）诸葛亮北伐，姜维投汉。被诸葛亮任命为仓曹掾，封奉义将军，当阳亭侯——当时的姜维还只有27岁，可见诸葛亮对他的器重！诸葛亮对姜维的评价是：“姜伯约忠勤时事，思虑精密……其人，凉州上士也。”并着力培养，希望成为自己军事上的接班人。

234年诸葛亮死，姜维任右监军辅汉将军，统诸军，并进封平襄侯；

243年，迁镇西大将军，领凉州刺史；

247年，迁卫将军，与大将军费祎共同主持尚书事务；

253年，费祎被害，254年后主任命他“督中外军事”，开始执政。

（二）连续伐魏，徒耗实力

姜维的战略指导思想是：利用自己熟悉“西方风俗”的优势和自己的军事才能，拉拢羌、胡等少数民族武装为帮助，抢夺魏国自陇以西的疆土（包括西域？）。应该说这个目标并不过分，而且姜维也确实是一位优秀的将领。但是连年出兵还不能实现，说明以蜀汉的实力根本不能与魏国相抗衡；另外，者和姜维对垒的是一代名将邓艾，也算他运气不好。

1，延熙16年（253年）夏，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，经董亭，围南安，最后粮尽退还；

2，254年，姜维复出陇西，魏国守狄道长李简举城投降。进围襄武，斩杀魏将徐质，魏军败退。维乘胜多所降下，掳河间、狄道、临洮三县居民而还。——这可以说是胜利，但是最后成了抢占人口，并没有战略上的意义；

3，255年，又与车骑将军夏侯霸等出狄道，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於洮西，杀死魏军数万人；此时，大将张翼劝姜维适可而止：“可止矣，不宜复进，进或毁此大功！”可惜姜维不能采纳；

4，256年春，姜维封大将军，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相约在上邽会合，胡济失约，姜维被魏大将邓艾战败于段谷，星散流离，死者甚众。姜维引咎自，为后将军，行大将军事。斋

5，257年，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淮南造反，魏国被迫分关中兵东下。姜维乘虚伐魏，率数万人出骆谷，径至沈岭。被魏大将军司马望、邓艾阻击。258年，无功而返。回成都，复拜大将军。

6，后主景耀5年（262年），维率众出汉、侯和，为邓艾所破，还住沓中——这是他最后一次伐魏了。

（三）防御体系的调整与重大隐患

与诸葛亮伐魏不同，姜维的战略冒失而又冒险。多次伐魏，大大损耗了兵力，姜维当然不愿意因此而停止，他又进行了一个更加冒险的举措，调整国家防御体系，从中抽取兵力出击——事实证明，姜维的这项措施不仅没有帮助他取得进攻的胜利，而且蜀过连必要的防守力量也消耗殆尽了！

从公元219年刘备攻取汉中，任命魏延为汉中太守一直到257年将近40年期间，汉中方面一直承受着来自魏国的威胁。蜀汉这个方面的防守策略是“错守诸围”，就是在各个路口建成许多个“围”——即简易的小城，派兵随时把手，使敌人无法进入国土。

257年姜维伐魏失败，深感实力不够，于是向后主建议：“错守诸围”这种方法虽然保险，并合乎周易的“重门”之义，但是只能防御敌人，不利于攻击敌人，因此只有支出没有收益。不如减少各个“围”的兵力，如果知道敌人来了，“围”里的部队就退到汉、乐两个城里防守。

只保守重要的关隘，蜀中的道路险阻，野外又没有粮食，敌人不能持久，必然疲劳，再由游击军骚扰他们。等敌人退兵的时候，各个城里面的士兵再一起出来追击，一定可以大胜！姜维还把这个方案美其名曰“殄敌之术”，其实是一种门户大开，极其冒险的部署！

也只有经过这样的“改革”，姜维才能抽调力量进行最后一次的北伐，但是262年失败后，他也就再没有主动出击的能力了。一年以后，蜀汉便宣告灭亡。而邓艾灭亡蜀汉，直捣成都的策略，正是利用了姜维这种小路不设防的致命失误！

（四）腐朽到接近崩溃的朝廷

后主刘禅的确是个不好评价的皇帝。一方面，他相信重臣，放手任用，而且对大臣还是比较宽慈的，诸葛亮去世后也是这样；另外，他似乎对朝政不怎么感兴趣，不励精图治也不过分胡作非为。但是做皇帝念头多了，享乐思想和习惯必然滋生，而且身边的小人也会随之而增多。这种趋势一旦到了影响朝政、祸害国家的程度，这个政权就危险了。——贤臣和宦官地位的更替，生动地刻画出后主沦落的轨迹。

1，董允主持宫廷时期。董允原为太子舍人，后主登基，诸葛亮认为他“秉心公亮”，任命为黄门侍郎，后代费祎为侍中。对后主多有规劝。后主成年后逐渐喜欢宦官黄皓，但是董允经常“上则正色匡主，下则数责於皓”。黄皓畏惧，不敢为非。一直到延熙9年（246年）董允去世，黄皓的职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黄门丞。

2，腐化时期。253年费祎去世，姜维一心伐魏，朝政开始败坏。到了258年，黄皓终于到了把持朝政的地步。右大将军阎宇与黄皓勾结，阴谋取代姜维大将军的兵权。258年姜维回成都，劝后主杀黄皓，后主说：“皓趋走小臣耳，往董允切齿，吾常恨之，君何足介意？”——一向温和的刘禅说出这样绵里藏针的话，姜维不由不害怕，于是姜维出镇沓中，实际上是为了避祸，此后，蜀汉朝政更加溃烂。

但是，蜀汉朝廷里的气愤最终也没走到恐怖和血腥的地步，如投降派谯周、忠贞的郤正，都在朝廷有容身之地，这与后主的性情应该说是很有关系的。

五、公元263年：迅速和传奇的败亡

这一年，蜀汉在魏国的打击下迅速崩溃和灭亡。一切来的这么突然，让人促不及防，然而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，事情发生的一切条件其实都已经具备了，只不过众多当事人的表演精彩而出人意表——因此，《演义》的作者对这段奇幻的故事当然也没有放过，不禁浓墨重彩地描了一笔。

（一）荒谬而指明的“失误”

263年的沓中，姜维刚刚从朝廷内部的斗争中稳定的心神又重新充满了恐惧：自己老对头钟会正在关中厉兵秣马，看来这次真的要大举入侵了！国家的军事实力姜维最清楚，而朝廷内部的情形更让他充满了危机感。他马上上表给皇帝：请迅速派遣张翼、廖化率领诸军，防守阳安关口、阴平桥头等战略要地！

然而，黄皓专权现在已经再不是一句空话了！黄皓得到消息后郑重其事地先请教了神灵，当巫师（或者巫婆）告诉他“敌终不自致”的话以后，黄皓建议刘禅别理这个岔，于是，这个十万火急的军情朝廷内外居然都不知道。这个事情如此荒诞，其背后可能是：1，黄皓还沉醉于和姜维的斗争中，把这个事情当作反对和打击姜维的“人民内部矛盾”了；2，可能黄皓早已得到魏国的重贿，期待着卖主求荣了。然而刘禅如此糊涂就不可理解了，或许，从当年费祎的迷信行为中可以联想到，费祎作为刘禅少年时候的老师，对他的教育实在是太“到位”了。无论如何，这个致命的错误都大大加速了蜀汉政权的灭亡！

（二）艰难而失败的抵抗

刘禅直到确认“钟会将向骆谷，邓艾将入沓中”的消息，才匆忙派廖化来沓中支援姜维，张翼、董厥等人到阳安关口帮助把手各处要隘。援军到了阴平，又闻知魏将诸葛绪正向建威，又匆忙赶到建威防守。随后，姜维被邓艾所战败，退守阴平。随后，边界多个要隘关口失陷，

钟会进兵。姜维、廖化、张翼、董厥等人只好合兵一处，退守剑阁，以抵御钟会。钟会无法前进，粮草无多，准备撤兵。

（三）邓艾出奇制胜，后主投降

让人不可预料的是，邓艾从阴平进发，沿着人迹荒芜的景谷道傍进入四川盆地，一下子如神兵天降，并冒死战斗，在绵竹大败诸葛瞻。当时的成都城高粮足，在谯周等人的劝说下，后主居然向处境极其凶险的邓艾孤军投降！

绵竹失败的消息传到姜维军中，当时有传言说后主要固守成都，也有说后主想入东吴避难的，还有传说皇帝要到南中求救的。一时不可分辨，姜维正在思考怎么应对，突然接到皇帝的敕令，要他们投降！将士们无不愤怒，甚至拔刀砍石。但是姜维还是率领部队向钟会投降——因为他正在酝酿一个石破天惊的“复国计划”！

（四）为蜀汉殉葬的三位名将

“才看西蜀收降将，又见长安动大兵”——当时的军事形势真是诡异而复杂！

先是邓艾居功自傲，暴露出自己的野心，随之，司马昭命钟会向成都治办邓艾，自己也发 10 万大军到长安，以防以外。钟会本来就有野心，一看司马氏连自己都怀疑了，就想联合姜维反魏，称王于西蜀。而姜维也试图通过钟会的野心实现自己的梦想。

但是，经过一场瞬息万变的演出，姜维、钟会、邓艾三位名将——一身死——不是他们谋略不够，大势所趋，人力是无奈的。这三位名将算是不情愿地充当了蜀汉帝国的殉葬者。

这个故事《演义》中介绍很详细，与《三国志》也大体一致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“时势造英雄”，在一个平庸的时代，即使有了英雄的一切内在素质，终究也是惘然。在蜀汉政权的最后 30 年中，大家似乎都在默契地等待一个结局的到来，即使有不甘心的挣扎，最后还是难逃宿命。

——这是一个梦想泯灭的时代，一个随波逐流又心安理得的时代，一个在因循中走向宿命的时代，一个如果有英雄，也只允许是失败的无助的英雄的时代。此后，这样的时代还曾经出现过……

力主降魏的蜀汉代表人物

谯周

谯周（公元 201—270 年），字允南，巴西西充国（今四川阆中）人。蜀汉地区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。史学名著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即出自他的门下。

步入仕途直言劝谏

谯周的父亲谯贻是一位学者。他学识宏富，尤善《尚书》，对于诸经及图纬书的造诣也很深，因而在益州颇有名气。刘焉、刘璋父子统治时期，州郡政府多次辟请他出仕为官，皆遭拒绝。后不得已，谯贻应州府之召，暂作过一段师友从事的职务。

在谯周的幼年时期，谯贻不幸去世。由于家境贫寒，谯周被寄养在舅父的家里。他酷爱读书，家中虽然经济困难，但谯周却从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产业方面来，整日孜孜不倦地诵读典籍，以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。经过多年的苦读，谯周成了博贯古今、精通六经的硕儒。特别是他一手词理渊通的好文章，更引起学人的景仰。但是其口才不佳，虽然为人聪慧，而不善言辞表达，属于性格内向的一类人。

谯周的青少年时期，益州地区的形势一直不够安定。先有刘璋与汉中张鲁的争斗，后又发生刘备入蜀，攻陷成都，逐走刘璋，建立蜀汉政权的变故。蜀汉章武三年（公元 223 年），刘备在夷陵兵败后病逝于白帝城，其子刘禅嗣位，是为后主。诸葛亮受刘备临终遗命，以丞相兼领益州牧，总揽朝政。在他的治理下，蜀汉的政局渐趋稳定。为了缓和与弥缝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矛盾，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团与外来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，诸葛亮适当地启用当地的知名人士为官。这样，谯周以有学识而被诸葛亮荐举为益州的劝学从事。建兴十二年（公元 234 年），诸葛亮病故，大将军蒋琬接替诸葛亮执政。蒋琬提升谯周为典学从事，总管一州学校、生徒的训导、考核和升免等事。这一年，谯周三十三岁。

延熙元年（公元 238 年），后主立其子刘璿为太子。谯周与李撰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同时被选调到太子府任职。他先为仆，后转为家令。蜀汉后主刘禅是一位平庸低能的君主。诸葛亮在世期间，他慑于乃父遗命，被迫“父事丞相”，在诸葛亮面前唯唯诺诺，言听计从，因有所约束，未出过大错。诸葛亮死后，刘禅贪图奢华享受的恶性日渐暴露。他屡次想广修宫室，采择民女，以供玩乐。但由于受到蒋琬、董允等人的强烈抵制，也未尽如意。延熙九年（公元 246 年），蒋琬、董允相继去世。主管朝政的费祎信任陈祗，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职务。陈祗是个玩弄权术的政客，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，操弄权柄。对于后主刘禅，陈祗、黄皓阿意顺从，百般迎合。刘禅遂如释重负，肆意胡为起来。于是，他经常外出游逛，并增造后宫，广设伎乐，沉湎于酒色之中，不理朝政。

谯周对刘禅的荒唐行径，非常反感。这一年，他上疏进行劝谏。谯周以新莽末年的历史为例，说明政权的得失与人心的向背关系极大。他说，王莽败后，群雄扰攘，豪杰蜂起，都想夺得政权。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刘玄和公孙述的力量最强，但他们一个个注意的只是快情恣欲，游猎享受，从不知体恤百姓疾苦，关心人民的生活。终因丧失人心，遭到失败。而汉光武帝刘秀从善如流，广纳众谏，注意理冤狱，力节俭，施仁政，遵法度。这些作法深得人心，归附的人越来越多，终于由弱变强，兼并诸雄，成就帝业。谯周希望后主以刘秀为榜样，敬贤任才，力修内政，树立起完成光复汉室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。在上疏中，他还提出了省减乐官、停止兴造的具体建议。

刘禅对于谯周的上疏，很不以为然，不仅不采纳他的建议，反而疏远了他。这一年，谯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职务，改任中散大夫。

延熙十六年（公元 253 年），主持朝政的费祎被魏将刺杀。费祎死后，蜀汉的政局急转直下。后主更加宠信黄皓，听凭他肆意弄权，败坏政事。朝中的大臣，或与黄皓勾结，狼狈为奸；或受其毁谤，横遭排抑。接替费祎职务的姜维，一则惧怕黄皓的势力，二则急于立功，所以长期居外，连续向曹魏用兵。由于姜维不顾国力，冒然出击，所以一再损兵折将，大败而还。穷兵黩武和政治腐败，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瘵，怨声载道。谯周对此十分不满。延熙二十年（公元 257 年），他猛烈抨击朝政，并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他知道自己的意见，不会受到朝廷的重视。退朝以后，遂采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写了一篇讥讽时政的文章《仇国论》。在文内，谯周提出治国的根本在于养民恤众的主张。他说，周文王以少胜多，是作到了注意养民；勾践以弱胜强，是由于能够恤众。不顾百姓疾苦，不能与民休息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，所谓“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，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。”他预言，蜀汉“极武黩征”，必然“土崩势生”，如果“不幸遇难，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”。谯周劝告后主，“不为小利移目，不为意改步，时可而后动，数合而后举”，“射幸数跌，不如审发”。就是说，与其每战必败，不如慎重出击。

不久，后主解除了谯周的中散大夫职务，升任为光禄大夫。在汉代，光禄大夫主顾问应对，无常事，是一种名义上地位很高，而实际上并无任何权力的荣誉官职。从此，谯周被排斥出参政的行列，“不与朝政”。因为他在学界极有声望，朝廷不得不“以儒行见礼”，但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。

兵临城下倡言降魏

景耀六年（公元 263 年），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看到蜀汉政权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，遂决定出师灭蜀。这年冬，他派钟会率兵十万，由汉中趋剑阁；命邓艾领众三万，自狄道入蜀。几路大军中，邓艾一支首先获得成功。他一路攀木缘崖，冒险而进，渡阴平，陷江油，下绵竹，长趋直入，逼近成都。

对于这种危急局面的出现，后主刘禅事先毫无思想准备。黄皓等人愚弄他，屡进鬼巫之说。刘禅真的以为敌人不会来攻，故不作任何防备。待魏兵猝至，百姓迸散，刘禅才慌了手脚，急忙召集群臣会议，商讨对策。由于形势急迫，“不与政事”的谯周也例外地被召参加了会议。群臣商议了许多，意见不能统一。这个说，吴蜀两国是联盟，东奔吴国是有条出路；

那个讲，南中七郡，阻险斗绝，易守难攻，南下或许死而复生。争争吵吵，议论纷纷，举朝上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时，谯周别树一帜，提出降魏的主张。他认为，东奔吴国的意见不能成立。魏吴两国，实力相差悬殊，魏能并吴，吴不能并魏，已成定局。投奔吴国是称臣，投降魏国，也是称臣，与其向小国称臣，不如向大国称臣，以免受再辱之耻。至于南下，也不是好办法。首先，大敌逼近，人心离散，恐怕无人愿意南行。再说，魏人此行誓在灭蜀，陷落成都也不会放弃南下追击的机会。况且南中诸夷，平时犹不安定。如果据守此地，增征贡赋，也就会激起他们的反叛。所以，乘没有势衰力竭的时候投降魏国，可以得到优待。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。谯周的主张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团的普遍情绪。他们早已对蜀汉政权失去了希望，认为这一外来政权，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，从未有过任何的好处。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职务不久，谯周曾与蜀郡学者杜琼一起散布过曹魏代汉是天意的言论。后来，谯周屡次在刘备、刘禅的名字上作文章，说什么：“先主讳备，其训具也；后主讳禅，其训授也，如言刘已备矣，当授与人也”（《三国志·杜琼传》）。意思是讲，蜀汉政权的寿命在刘备时代就该结束了，刘禅只有等待被别人消灭的分了。经过谯周的反复劝说，刘禅听从了降魏的建议。由于谯周主降有功，司马昭封他为阳城亭侯。晋武帝代魏后，谯周几次被加官，历任骑都尉、散骑常侍等职务。泰始六年（公元270年），他病死在洛阳，终年六十九岁。

后世的许多史学家对谯周诱劝刘禅不战而降的作法，给予了指责。孙盛在对蜀汉实力进行分析之后，认为当时如果没有谯周的劝降，蜀国是不会灭亡的。

儒学大师史学大家据《三国志·谯周传》记载，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，计百余篇。之后，这些著作陆续散失，到唐初作《隋书·经籍志》时，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《论语注》（十卷），《三巴记》（一卷），《谯子法训》（八卷），《古史考》（二十五卷），和《五经然否论》（五卷）五种了。《论语注》和《三巴记》两书，今不存。现在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，且都是后人的辑本。《谯子法训》，原书亡佚。明人陶宗仪、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，但均搜括不足，除《齐交篇》有篇名外，余者皆为散条。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、男婚女嫁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，属格言性质的书籍。

《五经然否论》，原书亡佚。朱彝尊、马国翰等人皆有辑本，其中以蔡映台搜罗最多，计七条。仅就辑录所知，该书以诠释古代礼仪制度的内容为主，属典制一类的著作。《古史考》，原书亡于宋元之际。清人章宗源据诸书辑录一卷，得九十一条。该辑本刊于平津馆丛书之中，书前有孙星衍序文一篇。这是一部古史考证性质的书籍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据《晋书·司马彪传》记载，谯周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纠谬。谯周认为《史记》周秦以上的部分，有很多内容采用民间传说和百家之言，因此与经典文献的出入较大。他凭据旧典，对此一一进行了订正。以后唐朝人把它归在考史书类，作为附录与《史记》并行于世。它的许多成果被后来的《史记》三家注所吸收利用，成为章氏辑本的主要依据。《古史考》对《史记》的考证、评述甚详。清人姚振宗在《隋书·经籍志考证》中讲：“是书专为考《史记》百三十篇而作，每篇皆有所考。”裴骃的《史记集解》，在《楚世家》楚之先人“坼剖而产”句下引干宝语云：“先儒学士多疑此事。谯允南通才达学，精核数理者也，作古史考，以为作者妄记，废而不论。”这条材料证明，只有当谯周以为作者妄记处才废而不论，可见姚氏的说法并非妄断。《古史考》对于《史记》的研究，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：第一是对史记的某些记载提出怀疑。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把公伯僚列为孔子的弟子。谯周认为有误，说：“疑公伯僚是谗愬之人，孔子不责而云其如命何，非弟子之法也。今亦列比七十二贤之数，盖太史公误。”第二是对某些史实给予补充和解释。如《苏秦列传》中，苏秦嫂有“见季子位高金多”语，谯周补充说：“苏秦字季子”，比“其嫂呼小叔为季子”的解释更为合理。对《齐世家》中“太公望吕尚”句，补充说：“姓姜，名牙。”对于吕尚的经历，补充说：“吕望尝屠牛于朝歌，卖饮于孟津。”在《张仪列传》中有“苴蜀相攻击”句，谯周解释说：“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，音与巴相近，以为今之巴郡。”第三是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论。如对吕不韦以

千金行贿事论说道：“以诈获爵，故曰窃也。”对司马迁说“驺衍其言虽不轨，僬亦有牛鼎之意乎”评论说：“观太史公此论，是其爱奇之甚。”其实，《古史考》所涉及的内容不止是《史记》，据章宗源讲：“（古史考）又兼及后汉事，不独纠迁书矣。”总之，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，对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影响很大。只是原书亡佚，后人已难看到它的全貌了。

关于蜀汉的灭亡，还有两个问题很有意思：

（一）关于后主时期的迷信风气。

后主本人是个很迷信的人，一是在关键时刻居然听信巫师的话，耽误了军国大事；还有，他在 263 年夏天改元“炎兴”，似乎是改了年号就可以时来运转，万事大吉了——就象打牌不顺的时候搓搓手一样。

后主共用了“建兴”、“延熙”、“景耀”、“炎兴”四个年号，在位 40 年，不知道伴随着年号的修改，皇帝是有政策调整还是纯粹就是为了吉利。

后汉时期迷信很盛行，道教的传播、纬书兴盛、品评风气的蔓延都是表现，从诸葛亮到蒋琬、费祎身上也似乎有浓厚的迷信色彩。

（二）关于蜀汉人口的问题

根据《蜀记》记载：后主投降，派遣尚书郎李虎给邓艾送去国家的士民簿——帐单：蜀国一共是，户二十八万，男女口九十四万，带甲将士十万二千，吏四万人，米四十馀万斛……

按照这个记载，当时蜀国的人口总量是 108 万 2 千人。

这个数字似乎小得过分了点。东汉全盛的时候全国人口是 5000 万以上，即使三国时候人口大量减少，似乎也不应该少于 1000 万。战国时候一个诸侯国就可以出兵 50 万，而者时候的蜀汉实力如此单薄，怎么能和魏国对抗 40 年呢？

其原因大概是——

1，蜀汉作为小国，连年征战，不修养生息，后来政治腐败，剥削严重，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；

2，南中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，由于诸葛亮确定的“粗安”政策，其实是相互独立，那里的人口根本没有算进来；再加上政治腐败，即使内地的人口也可能统计不全。

3，后汉当时豪强贵族都有大量的“私属”人口，是豪强的个人财产，不入国家户籍的。一些原在户籍的老百姓因为政府剥削严重，大量“逃籍”寻求好强庇护，豪强也借此和国家争利。

因此，个人感觉，当时蜀汉国的实际人口总量应该是在 200 万-300 万左右。

东吴投降时，记录的人口是：吏三万二千，兵二十三万，男女口二百三十万——共计 256 万人，东吴“私属”的现象尤其严重，孙权就经常赐给大臣人口，有时候达到 2 万人，这些人都是不在国家户籍的。因此东吴的实际人口似乎应该在 400 万以上。

几点补充

首先，蒋琬实施的计划为重蹈关羽旧路，可详《关羽东征荆州之探讨》，此路为攻取荆州，再威胁华夏。

其次，费祎也非鸽派，兴势之役即为费祎带兵援救，后来费祎甚至于开府治事，已有昔日诸葛亮前进基地之势。

第三，姜维之战略为蚕食陇凉，故屡次作战，最成功一次为洮西大捷，屠陇右数万人，魏明帝二次下诏大赦，如果再来几次数万战果，曹魏再大也会被磨蚀。

第四，蜀汉并未必败，若非汉中守将不战而降，汉中不一定必失，昔日曹操虽亲征而来，刘备仍能坚守，因此汉中没有一攻就破的道理，除非守将变节。另外邓艾的奇袭也是侥幸得手，入蜀后已遇守将马邕，可见邓艾并非入无人之地，若非马邕先降，后果仍有变化。五代唐敬瑭攻击四川，亦采阴平偷袭，但是西川节度使早备兵待战，击退偷袭。还有钟会虽在剑阁猛攻，时间一长，也有撤退可能，「会不能克，粮运县远，将议还归。」若非成都被袭，张

辽八百壮士追杀孙权十万大军的局面又再重现。

第五，帖名为等待或挣扎，即等死或奋战，等死可参考刘表据荆州，或江东孙家，休养生息，然后遇敌投降；至于挣扎或有损失，但是起码努力过，蜀汉立国就有不断变节降臣，如关羽时的南郡太守及公安将军、汉中及阴平守将皆降，包括君主刘禅，悉数投降不战。好战之下都有降臣辈出，若改等死，大概举国降声隆隆。

谢风行家兄的补正，魏灭汉的战争进行了半年，姜维率领国家主力尚不能战胜邓艾、诸葛绪的偏师。而阳安关口首将蒋舒投降，又使钟会的主力 10 多万人进入，当时蜀汉实际上已经捉襟见肘了。

邓艾出奇兵，有侥幸的成分，但刘禅投降说明蜀汉不但军力不足，而且内政溃烂，灭亡如此迅速也是合理的。

另外更正一点：

为期 40 年的蜀汉政权刚刚度过了 11 个年头——蜀汉政权正式建立于 221 年，到 234 年诸葛亮死，为 12 年。